

性别失衡与女性上升婚姻

——你愿意坐在宝马里哭泣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荆逢春*

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已落下帷幕,除了尽情享受全家团聚的幸福和喜悦,单身青年尤其是大龄单身女青年们是否正在感慨终于逃离了家庭聚会中的各种逼婚问题?疲于应付之时你是否想过现在中国社会的婚恋市场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剩女问题会如此吸引眼球?婚姻中的男人女人们幸福吗?本文针对此系列问题,把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介绍给大家,或许能对大家有一些启发。

1. 中国婚姻市场上女性上升婚姻已成主流

在杜巨澜、王永钦和张晏(Du, et al., 2014)合作完成的最新论文中,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中国婚姻市场的显著变化特征,并指出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为了更好地理解作者的研究结论,先向大家介绍文中的几个专有名词。Positive assortative,“门当户对”——婚姻内双方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具有类似的收入;Negative assortative则是相反的意思;Hypergamy,“高攀”——指从某些维度(如社会地位、收入等)来看,一方与比自己更高级的人结婚。为了在本文中描述方便,这里我们将 Positive assortative 翻译为“平等婚姻”,hypergamy 翻译为“上升婚姻”。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这份详实的数据,作者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中国婚姻匹配变化的图景。作者分别从家庭背景、个人收入、户口三个角度考察了从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婚姻匹配的变化情况。以家庭背景为例,在调查过程中,被采访者会接受以下问题询问:“在您的婚姻中,您的家庭背景是否比您配偶的家庭更富有、富裕一点、一样富有、穷一些、穷很多?”,答案分别对应指数5、4、3、2、1。如果一个男性的答案是5或4,那么他的婚姻就是女性上升婚姻;如果答案是3,就是平等婚姻;如果答案2或1,那么就是男性上升婚姻。以家庭财富差距以及个人收入差距为例,图1为我们描述了中国婚姻市场匹配模式的变化情

* 荆逢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博士;电子邮箱:uibejingfengchun@163.com.

况。事实上作者发现不管是从哪个角度,1950 年至 1980 年,平等婚姻占据主流,但自 1980 年始,平等婚姻的比例不断下降,女性上升婚姻的比例不断上升。

图片来源于杜巨澜等合作发表的论文。图 1 中的左右两图分别从父母财富差距和个人收入差距的角度描摹了中国婚姻市场匹配模式的变化情况。位于顶部的红线表示平等婚姻所占的比例,中间的绿线和底部的蓝线分别表示女性上升婚姻和男性上升婚姻所占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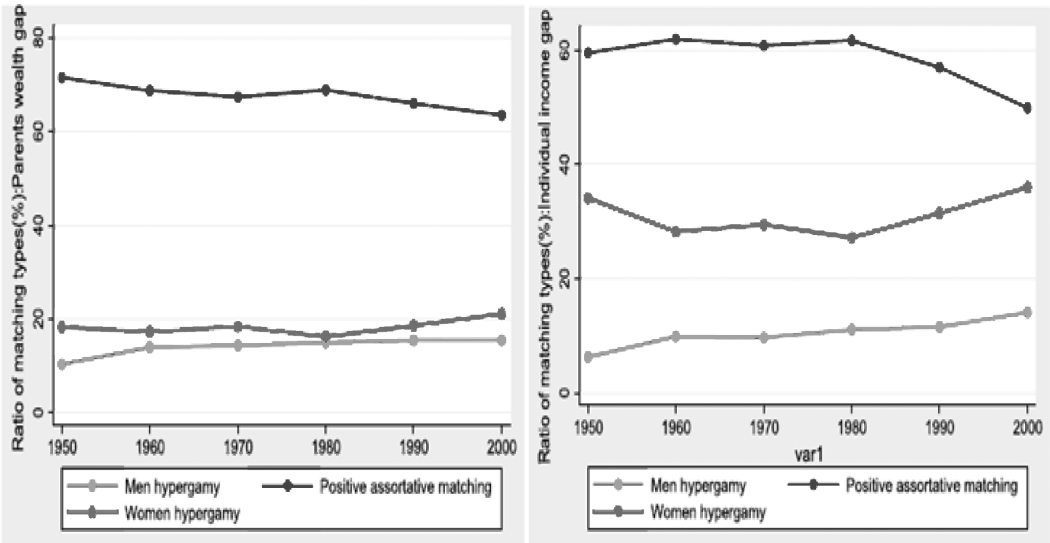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婚姻匹配模式变化情况

在考察中国婚姻匹配度的同时,作者也注意到了另一个典型事实特征——愈加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作者计算数据显示,男女性别比已从 1982 年的 108.5 : 100 上升到 2010 年的 118.6 : 100。一些学者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实施的经济自由化与土地改革所带来的性别回报率差异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通过 B 超对胎儿的性别判断,对男孩有显著偏好的中国父母会在产前通过流产对胎儿进行性别筛选。

2. 性别失衡显著促进女性上升婚姻

基于理论模型的分析与实证模型的验证,作者认为性别失衡是导致婚姻不匹配度上升的重要原因。

作者指出性别失衡提高了女性在婚姻市场的议价能力,直接导致女性上升婚姻比例的增加。不管是从父母财富差距、个人收入差距以及是否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角度,性别失衡对女性上升婚姻都有显著的正向的影响。如果从是否在企业工作以及是否拥有户口的角度来看,性别失衡的影响统计上并不显著。但很有趣的是,作者发现:2000 年以后,父母财富差距与户口

因素变得更重要了。这也符合普遍认知,收入不平等加剧以及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年轻人靠自己努力较难在短时间内买房并过上优质生活,这种现象在大城市更为明显,显然上升婚姻中家庭背景的考量也必然变得更加重要。

研究中作者还发现一些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互补性:夫妻间户口属性差异越大,双方父母以及个人的财富差距也就越大;与户口相比,职业与经济要素就是典型的替代关系,女性更倾向于与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结婚或者在私营部门但是很有钱的人结婚。

然而,性别失衡与婚姻匹配具有很强的内生性问题,一些不可观察的变量会同时影响上述两个变量。以女性健康为例,男人总是希望娶一个健康的姑娘,女性身体的健康程度也会影响到其受孕及生育的状况。因此女性的健康或身体状况会影响其在婚姻市场的议价能力,也会影响胎儿的性别比。由此而来的内生性问题会直接导致回归系数不一致。为了解决此问题,作者按照 Wei 和 Zhang (2011) 的方法,利用违反独生子女政策罚款费构建了工具变量。^① 作者认为,罚款费率是由政府决定的,当个体在做出是否结婚的决定时,可以看作是外生给定的。同时罚款又与性别比高度相关,更高额的罚款会使家庭对胎儿的性别筛选更谨慎。在只能生一个孩子的前提下,父母可能会更依赖 B 超等技术提前判别孩子的性别以做出是否流产的选择。使用一定的计量方法,作者得到稳健的结论:性别失衡导致以经济指标衡量的女性上升婚姻的比重显著上升。^②

更有趣的是,作者还发现性别失衡显著地提升了女性的家庭地位。性别失衡显著地降低了妻子做家务的时间和丈夫对孩子教育问题的话语权,同时提高了妻子对贵重物品采购的话语权。这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性别失衡对女性在婚姻市场议价能力的提升作用。

3. 剩女问题

几年前《非诚勿扰》上那句“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风靡一时,而今拜金女、富豪相亲俱乐部、各种企图通过婚姻改变生活状态及金钱状态的典型事例层出不穷。按照上文的分析介绍,此刻我们也不难理解近年来婚姻市场的这些典型事例了。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女性在婚姻市场的议价能力不断提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女孩“剩下了”呢?

“剩女”,2007 年 8 月教育部公布的 171 个汉语新词之一,是指已经过了社会一般所认为

① 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导致回归系数不一致,经济学家通常通过寻找工具变量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工具变量是指某一变量仅和内生的解释变量存在相关性,但和误差项不相关。

② 文中作者使用的是 GMM-IV 方法。

的适婚年龄,但是仍然未结婚的女性。^①一般而言,“剩女”可理解为 28 岁及以上的单身未婚女青年,通常受过高等教育,收入颇丰,事业有起色。而在传统婚恋观念依旧为主导情况下,“剩女”标签通常带有贬低意味。

剩女问题吸引了大量学者的研究注意力。如表 1 所示,2005 年至 2010 年间,中国 25 至 39 岁间的未婚女性占比增长了三倍多。尽管增速迅猛,但相较于亚洲其他国家来说,未婚女性的比例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研究发现,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及经济地位的提高,晚婚比例大幅增加的现象在中国及其他国家普遍存在。原因之一是,成功的职业女性进入婚姻及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更大,对职业的热爱、事业的投入、物质约束的降低、精神层面的丰富等因素,都会推迟女性进入婚姻状态的决定。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发现了一些更有趣的现象——推迟结婚是女性逃避婚姻关系中内在的性别不平等的一种方式。Salaff (1976) 发现香港的未婚女性认为婚姻会给职业女性带来更多的负担,对女性赋予更多的家庭责任,因此更愿意以推迟或者不结婚来逃脱这种性别定式带来的不平等。Nemoto (2008) 对日本的调查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由于受到父母婚姻中母亲弱势地位的影响,许多接受调查的女性不愿如母亲一样由于缺少经济基础而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状态,因而更倾向于在职场打拼而不是步入婚姻。

因此,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所谓“剩女”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自我选择,而不是被动的筛选与放弃。

表 1 各年龄段未婚女性占比情况

	中国		韩国	新加坡	日本
	2005	2010	2010	2010	2010
25–29 岁	8.7%	21.6%	59.1%	54.1%	60.3%
30–34 岁	1.4%	5.4%	19.0%	25.1%	34.5%
34–39 岁	0.5%	1.8%	7.6%	17.1%	23.1%

数据来源:联合国 World Marriage Data.

4. 高攀的婚姻幸福吗？

性别失衡问题不可回避,上升婚姻已然是社会主流,那么更重要的问题来了:高攀的婚姻幸福吗? 值得吗? 在雷晓燕等 2014 年最新的论文中,作者利用详实的数据和严谨的经济学分析,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

“幸福”是一个个人标签异常浓重的指标,该文中作者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① 来源百度百科。

(CHARLAS)数据,利用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婚后生活质量的主要指标。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作者还利用抑郁量表做了进一步的考察。在追踪调查中,被调查者会被要求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否满意做出回答:5 极其满意,4 非常满意,3 比较满意,2 不太满意,1 一点也不满意。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控制了教育水平、年龄、孩子数量、婚姻持续时间、消费水平等多项控制个体差异控制变量,作者发现女性上升婚姻会提升生活满意度,“但是这种效果更多地存在于经济落后的地方,且只存在于农村。对于经济发达的地区影响相对较弱,在城市则完全没有影响。”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为什么随着教育程度及经济地位的提高,“剩女问题”更加严重。上升婚姻并不能显著提升经济发达地区女性的生活满意度,同时在该地区打拼的职业女性选择婚姻的机会成本也更大,因此,推迟结婚甚至不结婚也在情理之中。

把婚姻放在经济学的框架下剖析研究,似乎是件特别冰冷的事情。同时,从个体角度来说,结婚是个复杂的决定,绝不单是几个指标所能刻画和描摹的。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这么浪漫动人的情愫非要与户口财富等挂钩,实在是大煞风景。但正是这旁观者冷静客观的角度,更能告诉我们目前婚姻市场的现状和本质,或许也更能找到通往幸福的捷径。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女性地位的提升,婚姻市场的匹配必然更加多样、更加复杂,上升婚姻不一定显著改善生活满意度,剩女也不应该被标签化。面对逼婚,最重要的莫过于了解现实,认清自我;面对所谓“剩女”,最重要的莫过于改变观念,切不要以某些简单的标签来定义别人的幸福。

参考文献:

- Du, Julan, Yongqin Wang, Yan Zhang, 2014, Sex imbalance, marital matching and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forthcoming.
- Nemoto, Kumiko, 2008, Postponed marriage: Exploring women's vies of matrimony and work in Japan, *Gender and Society* 22, 219-237.
- Koo, Wan Ning, 2014, “Leftover wome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orking Paper, available at http://works.bepress.com/wanning_koo/1/.
- Salaff, Janet W., 1976, The status of unmarried Hong Kong women and the soci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ir delayed marriage, *Population Studies* 30, 391-412.
- Wei, Shangjin, Xiaobo Zhang, 2011,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9, 511-564.
- 雷晓燕、许文健、赵耀辉, 2014, 高攀的婚姻更令人满意吗? 婚姻匹配模式及其长远影响? 《经济学(季刊)》第 1 期, 31-50。